

中国
见解

CHINA
VIEWS

用“见解”来自我标识，是因为我们大家来自中国特色的大社会学。北京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是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工作、人口学、民俗学诸学科的共同平台，而我们的博士后人员来自更广的范围，

民间社会的组织主体与 价值表述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联谊会

周星 于惠芳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CHINA

中国
见解

民间社会的组织主体与 价值表述

袁会芳 ◎主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间社会的组织主体与价值表述 / 周星, 于惠芳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1

(中国见解)

ISBN 978-7-301-17963-5

I. ①民… II. ①周… ②于… III. ①社会团体-研究-中国
IV. ①C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3821 号

书 名: 民间社会的组织主体与价值表述

著作责任者: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联谊会

周星 于惠芳 主编

责任编辑: 陈相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963-5/C · 062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0.5 印张 290 千字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编委会成员

(以姓氏拼音字母为序)

方李莉	高丙中	高志英	葛军娜
侯 猛	李 立	刘夏蓓	刘正爱
祁进玉	色 音	唐 军	陶 庆
杨 威	于惠芳	张丙乾	朱晓阳

直面社会事实,追求学术尊严

(序言)

周 星

以前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时的两位同事于惠芳老师和高丙中教授,嘱我为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联谊会主办的学术丛书“中国见解”的其中一辑写一篇序言,接收到文集的电子版以后,认真拜读了各位社会学及人类学新锐学者们的大作,深受启发,也颇有感触,于是就不揣浅陋地答应了写这个序言。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后流动站,大概是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建站最早的了。自1987年建站以来,一批又一批的年轻学人或从国外学成归来或从国内一些高校及科研机关博士课程毕业后,陆续到这里从事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民族、民俗研究等相关的学术探索工作,他们出站以后或留在北京大学任教,或分赴海内外各个研究机关及大专院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大家都迅速地成长为各自岗位上的学术骨干,也都在各自的专业学术领域做出了可观的成绩。由于这个博士后流动站曾经为大家提供了很好的学术氛围和研究环境,使得大家感到受惠良多,特别是研究者同行之间那些热烈讨论和相互切磋的记忆,更使大家非常怀念博士后研究这一段学问人生中难忘的经历。社会学博士后联谊会的应运而生以及大家共同创办的学术丛书“中国见解”,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为了能够使此种学术研究的精神和氛围得以继续和延展下去,并使得它能够为更多的学界朋友们所共享。

我本人很是赞同高丙中教授对“中国见解”所作的说明。所谓

“见”，就是要去调查，做田野工作，去看、去观察、去了解中国现实社会的基本事实，而无论这些事实是多么的惨淡和冷峻；所谓“解”，就是要以学术的精神和严谨的科学研究的方法去探讨、去追究，进而解读、解释、揭示或者说明研究者们所“见”到的那些社会事实和现象；把这样的“见”和“解”合起来，所谓“见解”，就是研究者的观点、看法以及基于自己学术研究的结论而提出的独立的主张，而不论此种见解是多么的不合“时宜”或不受待见。进而，所谓“中国见解”，自然也就意味着是中国学者的学术主张和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学术见解。

诸如像社会学、人类学这一类早期曾多少具有一些“舶来”属性的现代社会及人文科学，曾经在吴文藻、潘光旦、雷洁琼、费孝通等许多老一辈学者的努力下，经历过了“中国化”的多种学术实践并已有了相当程度的积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重新获得学科建制和发展机遇的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及民俗学等学术研究领域，在当下的中国更是日新月异，迅速地成长为“显学”，不仅学术研究的水准和学科规范逐渐得到提高，而且在涉及对于中国社会及文化的认知、涉及对中国社会转型及文化发展所面临的多种复杂问题的把握和理解等方面，都已取得了颇为可观的学术成就。在我看来，今天终于到了至少可以就涉及中国社会及文化的相关问题有根有据地发出一些中国声音、主张一些“中国见解”，进而再以此类见解去阐释和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服务于中国的国计民生，造福于黎民百姓，同时也以此类中国声音、“中国见解”积极地和外部世界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的时候了。由中国的学术就中国问题主张具有主体性的“中国见解”，原本就是理所当然的。这并非是执意要去渲染类似于民族主义的情绪，相反，我们坚信对于学术的追求就是对普适性真理的追求；坚信有关中国问题的“中国见解”需要有国际学术界所能提供的那许多种见解的参鉴、比较和刺激；坚信对于中国问题的认知非常需要有“他山之石”，需要外部的视角；深知在来自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的诸多见解中不只是有意识形态偏见、先入为主的误读，而是还有很多“局外者清”的真知灼见以及极具洞察力的学术智慧。对于“中国见解”之主体性的提倡，主要是说我们对于或多或少实际存在着的学术及思想的“殖民地化”现象，理应持有必要的警惕和抵制。

“中国见解”此辑所收录的16篇论文，无论是从其课题意识，还是从其基于田野工作和实地调查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抑或是从研究者对其研究课题的执著和责任感，都使我感到北京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那些优良的学术传统确实是得到了较好的继承和发扬，而所有这些点点滴滴的学术努力，最终都将能够汇集合流到“中国见解”的大潮之中去。“中国见解”此辑的主题是“民间社会的组织主体与价值表述”，在我看来，这样的主题设定不仅反映了本书绝大多数作者的学术价值取向，同时也能够反映出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及人民的基本和终极的关怀。

唐军的论文通过对国有企业改制中一个涉及产权变革的兼并案例的历时性考察，分析了失业或下岗工人作为社会行为者的抗争及其诉求背后的依据、策略和逻辑，指出他们的抗争实际上是具有“生存型理性”的集体行为。作者由此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学说提出反思，并强调了社会整合条件下劳工权益如何才能得到有效保障的问题。几乎是对相同或相似案例的研究，朱晓阳的论文却发展出了不同的取向，他的研究集中探讨了相关司法过程中的“事实”的认定及其与当地“情境”的纠葛关系，试图通过对一个具体的企业兼并纠纷案件的描述和阐释，深入地探讨与所谓“地方性”的法律实践相关联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观念问题，从而揭示出“现代司法理念”在“事实”认定中往往倾向于将其与“情境”或“情理”割裂开来的诸多症状。作者对以“合情合理”的在法律实践及其经验、规范去构建社会科学研究所需概念的可能性的主张，相信会给读者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基于对矿难事件频发的关注，张丙乾的论文试图揭示以矿产资源开发为特点的基层农村社区内部的权力结构关系及其运作的机制。从实证性的社会学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出发，作者围绕权力和“关系”对相关制度的基于“现实逻辑”的变通，深刻地分析了当地矿产资源的非制度化利用以及矿产资源资本化和权力运作之间的关联性。种种现实的场域令读者触目惊心，但它确实是中国一个“地方”赤裸的真实。色音论文描述的黑河流域生态危情，同样令人触目惊心。由生态危机导致的跨地域水事矛盾、地方发展瓶颈甚或民众生存的困境，除了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外，更有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盲目无序等方面的原

因。色音详尽介绍了地方政府强力主导的生态移民工程,并通过对一个具体移民社区的检验,指出了包括社区重建、产业转型、生活方式变迁及游牧文化流失等各种紧迫的问题。

陶庆的论文是对“福街”商人自治组织的民族志描述。通过对一个当代开发区中商人群落的结社及其获得“合法性”之奋斗历程的追溯,作者指出,此种“合群”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商人“部落”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其结果是促成了在个体商户和国家之间有一个资产者“公共领域”的雏形初现。或许和一般消费者或底层劳工相比较,商人群落未必就是弱势群体,但若是和公权力及其周边的寄生群体相比较,福街商人们的结社确实算得上是最为典型的民间组织的形态之一。高丙中对一个兼具“博物馆”和“庙宇”之双重属性的建筑物生命史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讲述,其实是以长达数年的民族志田野追踪的研究实践为基础的。作者对一个乡村社区里围绕“龙牌会”(一种民俗宗教活动)而展开的各种动态有着洞彻的观察和分析,进而向读者揭示了热衷于做“会”的村民们是如何运用包括“双名制”在内的多种民间智慧,最终实现了他们自己宗教活动的现实合法性。高丙中指出,这个过程不仅伴随着当地社会多种紧张关系的舒缓,它同时也是对乡村地方之公共空间的一种拓展。

杨威对某高校一个学院中的高校教师小群体的经验性研究,读来也是意味深长。单位组织通常被认为是国家或其机体的延伸部分,但杨威深入到其中的小群体及其人情关系网的世界中,却发现那里的人际关系其实是以冲突为常态的。自诩“精英”集中分布的世界实际上和中国其他类型的“民间”社会并无本质上的不同,这意味着我们距离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还有很遥远的道路要走。于惠芳和葛军娜的论文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对博士后研究人员群体的现状进行了细腻的量化分析。博士后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引进、培养和使用高层次专业人才方面所进行的最为重要的制度创新之一,两位作者运用来自某“研究型大学”的数据,集中讨论了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进站机会、出站流动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现了现行博士后制度有待改进的一些问题,堪资未来进一步改善时的依据。

当研究者们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图式适用于分析多民族构成

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诸问题时，显然，它在很多场景或情形下就不得不被修正为“国家与少数民族社会”或“国家与地方族际社会”的关系。诚如费孝通的多元一体理论所揭示的那样，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在全国很多地方比比皆是。李立的个案研究提出了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这一问题，视角颇为独特。作者对四川一个嘉绒藏族村落里汉族移民及其藏汉混血后裔的认同进行的考察表明，他们通常可能会面临更多困扰。李立用来描述他们生活中的那些“事件”和故事的笔触，生动而又细腻，读来如临其境。刘夏蓓对甘肃夏河藏传佛教觉姆寺出家女尼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来自宗教社区的案例。作者通过深入的访谈调查发现，觉姆寺现代女尼群体剃度出家的动机已经从生活所迫逐渐演变成为自愿自主的选择，在论述了与女尼出家相关的历史和宗教文化背景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揭示了当地藏族社会的制度结构和社会变迁对于女性宗教生活的影响。

祁进玉的论文对黄河上游一个多民族杂居的族际社会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包括其历史沿革、民族人口构成以及基于文化多样性格局的宗教认同。作者认为，居住格局对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指出宗教和族群性之间的复杂关联的同时，他还注意到了不同宗教体系之间的文化涵化与互动性。高志英论文通过对傈僳族迁徙史及与之伴随的文化变迁的民族史描述，试图说明傈僳族传统文化实际上具有“流动性”的特点。论文虽然是对族别文化史的追溯，但作者也充分地注意到了不同的地域背景和族际关系背景对其历史上文化变迁所构成的影响。

方李莉的论文侧重于讨论西部地区的人文资源和西部民间文化再生产之间的关系问题。作者从艺术人类学的立场出发，基于对西部地区诸多民间艺术的田野考察，指出民间艺术构成了西部人文资源的主要内容，它们被视为地方文化的象征、符号，是所谓民俗风情之魅力的源泉，因此正在被大量地利用于民间文化的重构和再生产的各种尝试。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专家学者对相关人文资源的发掘和界定、以当地民众生活为依托的乡土传统的影响之外，更有国家权力的介入和市场经济基于“资本的逻辑”而发挥的作用。刘夏蓓的另一篇论文对

30年来中国的古村落保护事业进行了反思,并探讨了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与传统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从人类学的立场出发,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事业必须要处理好保护什么、怎样保护以及由谁来保护等关键性的问题。

侯猛的论文主要是探讨涉及转型社会之乡村法律民族志的“方法和对象”问题。作者指出,转型时期中国的法律民族志需要整合法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的优势,并集中去调查和研究人民日常生活的“习惯”。侯猛认为,人民日常生活的习惯是嵌入在整个社会变革的过程当中的,受到了国家法律的深刻影响,因此,它还应该包括人民对国家法律的理解和认同在内。在展示了乡村民事习惯和国家法律之间互动关系所主要涉及的若干领域之后,作者进一步指出,对于所有这些领域均以深刻的田野个案研究方法予以发掘,就有可能逐渐汇聚成为法律民族志的“中国经验”。中国的人类学可以说是被动、后起和具有“边缘”性的人类学,因此,长期以来,积极地汲取了英美等国家的所谓“主流”人类学的学术资源,然而,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边缘”的人类学传统同样具有值得我们参鉴的价值。刘正爱对荷兰人类学传统的介绍,无疑将丰富我们对于国际人类学的全面了解。主要以其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地作为“田野”、以实用主义为特点的荷兰莱顿学派的人类学,曾在土著习惯法、亲属理论和社会结构研究等方面颇有特色,并形成了结构主义人类学思潮的一个重要支脉。

综上所述,“中国见解”此辑所收研究论文的各位作者,大都具有面向社会基层、关注民众生活和民间组织、聚焦于民生议题和弱势群体疾苦、直面现当代中国社会各种严峻现实问题的学术勇气;并且也都尽力采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各自学科的严谨、实证和科学的方法,去努力实现各自设定的学术课题目标,因此,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学术成果,对于我们深刻地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诸多问题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同时,相信各位作者也都会同意我说,本辑所有的学术论文都欢迎商榷,都需要来自学术界同行和广大读者的讨论、批评和检验,也都有进一步提高、深化和延伸发展的可能性。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拒绝批评和讨论的“学术”,自然不能成为真正有尊严的学术;如同容忍了不端、不正的“学

术”，自然也就难以获得公众由衷的敬意一样。

学问乃天下之“公器”，而不应是博取功名利禄、出人头地或恃才傲物、建构个人“威权”的道具。中国眼下正处在构建公民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尤其需要学者们直面社会事实、维护学术尊严，并且有勇气、有能力在公共领域就公共及民生议题大声和大量地发表独立、有创意和负责的“中国见解”。真正地追求学术尊严的研究者，天然地具有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潜质。从本辑各位作者的多篇研究论文中，我看到了此类潜质的存在，不仅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也非常期待各位后续的研究成果和专业成就能够有更加茁壮的成长。

以上仅是我拜读本辑各篇大作时的所感所想，信笔写来，权且为序。不妥和浅薄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各位作者、学术界同行及广大读者的海涵并不吝指教。

周星

2010年4月26日，于爱知大学

目 录

Contents

- ⌘ 直面社会事实,追求学术尊严(序言) 周 星/I
- ⌘ 生存资源剥夺与传统体制依赖:当代中国工人集体行动的逻辑
——对河南省 Z 市 Z 厂兼并事件的个案研究 唐 军/1
- ⌘ 事实与情理:一家国有企业的兼并纠纷案与社会科学观念
朱晓阳/24
- ⌘ 基于矿产资源开发的农村社区权力运作探析 张丙乾/55
- ⌘ 额济纳旗生态移民的环境社会学考察 色 音/82
- ⌘ “部落”的狂欢:福街商人自治组织的民族志
——转型期个体与国家之间“群”的兴起的公共领域意义
陶 庆/116
- ⌘ 中国当代一座博物馆一庙宇的民族志:从文化传统到政治艺术
的双名制 高丙中/140
- ⌘ 人情关系网与校园人际和谐
——一项关于高校教师小群体的经验研究 杨 威/154
- ⌘ 我国博士后现状的浅析与解释
——以研究型大学 A 为案例 于惠芳 葛军娜/174

❧ 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 ——藏族村落中的汉族移民身份认同叙事	李 立/191
❧ 从生活所迫到自愿选择 ——甘南夏河女尼出家原因的人类学调查	刘夏蓓/202
❧ 文化多样性与宗教认同 ——以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三川地区为个案	祁进玉/217
❧ 流动的文化和文化的流动 ——唐代以来僊僊族的迁徙及其文化变迁研究	高志英/232
❧ 西部人文资源与西部民间文化的再生产 ——艺术人类学视角	方李莉/243
❧ 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景观保护 ——三十年来我国古村落保护反思	刘夏蓓/267
X ❧ 转型社会的乡村法律民族志：方法与对象	侯 猛/276
❧ 一个“边缘”的传统——人类学在荷兰	刘正爱/294
❧ 编后记	/311

生存资源剥夺与传统体制依赖：当代中国工人集体行动的逻辑^①

——对河南省 Z 市 Z 厂兼并事件的个案研究

唐 军

一、问题的提出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其著作《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的导论中写道：“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未竟事业的回应，工人问题研究者常常被‘为什么不’的问题所困扰：工人为什么不能走向统一？工人，尤其是绝大多数惨遭剥削和压迫的工人为什么不去组织一个激进的政党？”^②其实，这不仅是其他“工人问题研究者”深感困惑的问题，也是裴宜理本人深感困惑的问题，只不过她用自己的这部著作部分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一)“铁饭碗”与“大锅饭”的聚合效应——无集体行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作为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

① 本文写作所依据的部分资料由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同事佟新教授提供，特此致谢。

② 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 页。

的实践,工人阶级被认为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而且具有最强烈的革命性,所以成为了新中国的领导阶级。在将这一优越的政治地位落实到社会生活特别是职业生涯之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工人阶级成员的有别于农民的生存方式:在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几乎工人阶级的全部成员都被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也就是“单位”所容纳,并因此而获得了全面的职业和生活保障。与这一生存方式相联系的就是工人阶级成员在这一制度环境中被形塑出的特殊的行为方式,即以自己对集体的效忠来换取生存和发展资源。其实,这不仅是工人的主动选择,也更是国家的制度安排^①。经由这一思想和制度建构,工人阶级在获得全面的社会保障和优越的社会地位的同时,也成为国家实现社会的工业化乃至现代化以及社会的稳定的重要力量。尤其在平均主义成为事实上的主流价值核心的时代,工人无须采取任何体制外的抗争行动即可满足自己基本的生活需求和心理需求,这就是所谓“铁饭碗”和“大锅饭”的聚合效应——无集体行动。

显然,我们这里所使用的集体行动概念的核心内涵就在于,集体行动指称非国家(政府或执政党)动员条件下社会行动者有目的、有组织地发起进行的表达、争取或维护自己权益的群体性活动。基于这一界定,我们所使用的无集体行动就与李静君甚至刘爱玉所使用的“collective inaction”或“无集体行动”^②有很大的不同,后者在使用“无集体行动”来描述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中国工人的生活境况及其行动选择时,其实已经注意到工人主体性的无声抗争,其前提是工人的被剥夺状态的真实存在,尤其是工人自己在清醒认识到这一状态后所产生的挫折感和剥夺感对其行为的驱动和导向,而其行为方式多为分散的、零星的怠惰、服从或退出。我们这里提出的无集体行动

① 华尔德(A. G. Walder)对中国企业中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考察这种制度安排的一个重要维度。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② Lee, Ching Kwan, 1998, “The Labour Politics of Market Socialism: Collective Inaction and Class Experiences among State Workers in Guangzhou”, *Modern China*, Volume 24, Issue 1 (Jan.); 刘爱玉:《国有企业制度变革过程中工人的行动选择——一项关于无集体行动的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2003 年第 6 期。

旨在说明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中国工人的社会位置及其行动特质，其突出内容是工人对于制度的接受和顺应，不存在或基本不存在工人在认知层面上对制度的置疑和否定及在实践层面上对规范的抵制和反抗，这一状态大致延续到对工人阶级地位造成巨大冲击的一系列制度变革肇始并扩展的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这之后我们将看到工人集体行动的萌生。

当然，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前后并非完全没有工人运动，但这些运动要么由国家动员而起^①，要么不是单纯的工人抗议行动^②，故我们在此不做详细的讨论。

（二）总体性地位受损的可能结果——集体行动

1979 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在观念层面上动摇了平均主义的价值，而且开启了制度层面的变革：农村在 70 和 80 年代之交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城市于 90 年代中期开始推开国有企业制度变革，通过改革以产权制度、经营制度、工资制度、用工制度、保障制度等为内容的企业制度体系，力图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最终提高生产和经营效率，以便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保有强大的竞争力以应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毋庸置疑，这一制度变革使企业复归于纯粹的经济组织，从而极大地提升了一部分国有企业的效率和效能，但与此同时，它又深刻地变革了企业内部的利益和权力格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阶级阶层研究、工人群体研究、企业制度研究^③等大多呈现了这样一种结论，即将管理人员和生产工人两相比

① 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第 346—352 页。

② 陈峰：《下岗工人的抗议与道义经济学》，载于燕南网（<http://www.yannan.cn/>）2005 年。

③ 这类研究数量庞大，可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李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刘欣：《相对剥夺地位与阶层认识》，《社会学研究》2002 年第 1 期；李汉林、李路路：《单位成员的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单位组织中依赖结构的主观层面》，《社会学研究》2000 年第 2 期；Bian & Logan, 1996,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等。

较,企业制度改革总体上更有利于前者,在企业事务中,后者无论在收入分配方面还是权力分配方面都处于失语的境地,工人阶级曾经具有的“企业主人”甚至“国家主人”的荣耀成为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普通工人成为事实上的弱势群体,特别是处于下岗或失业状态的人员,其生活境遇更是艰难。以北京市为例,2004年职工平均工资约为2362元/月,而最低工资标准约为545元/月,是职工平均工资的23.1%,失业保险金以最高缴费年限——20年计算为419元/月(从第13个月起则统一为326元/月),是职工平均工资的13.8%,不足五分之一。在这样一种总体性地位受损的景况之下,工人的抗议行动开始出现并呈现增加的趋势。已经为人所知的有2002年3月辽阳铁合金厂工人的抗议行动^①、2002年3月大庆油田工人的抗议行动^②等等,其中一些行动达到了数千人甚至数万人的规模。而根据政府的一项统计,1995年参加这种抗议示威活动的人数超过110万,波及到的城市有30多个;1998年,参加这种示威活动的工人人数则上升到360万。^③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裴宜理等学者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有其意义,只不过我们的关注点将转向工人在什么情况之下会采取集体行动?会利用什么样的手段展开集体行动?

工人的抗议性集体行动反映出社会矛盾乃至社会冲突的存在,深入认识这类集体行动内在逻辑的必要性十分突出,它有助于在学术上拓展相关的理论解释、在实践中建立有关的预警机制。河南省Z市Z厂工人因工厂兼并事件而展开的集体行动,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长时段的案例。

① Rocca, Jean-Louis, 2005, *La Condition chinoise. Capitalisme, mise au travail et résistance dans la Chine des réformes*. (Travail présenté en vue de l'obtention du diplôme national d'habilitation à diriger des recherches en science politique.)

② Ni, Ching Ching, 2002, "China's Booming Economy Lagging behind Persistent Unemployment." *The Los Angeles Times*, May 2.

③ 陈峰:《下岗工人的抗议与道义经济学》。